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史

第一册

〔埃及〕艾哈迈德·爱敏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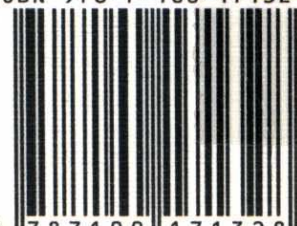


<http://www.cp.com.cn>



商务印书馆官方微信

ISBN 978-7-100-17132-8



9 787100 171328 >

定价：40.00 元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史

第一册

黎明时期

〔埃及〕艾哈迈德·爱敏 著

纳忠 译



商务印书馆

2019年·北京

بجزة الثاليف والترجمة والنشر

فكر الإسلام

يبعث عن الحياة العقلية في صدر الإسلام إلى آخر الدولة الأموية

تأليف

أحمد أمين

الطبعة التاسعة

١٩٦٤

本书根据 1964 年阿拉伯文第九版改译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出版说明

我馆历来重视移译世界各国学术名著。从五十年代起,更致力于翻译出版马克思主义诞生以前的古典学术著作,同时适当介绍当代具有定评的各派代表作品。幸赖著译界鼎力襄助,三十年来印行不下三百余种。我们确信只有用人类创造的全部知识财富来丰富自己的头脑,才能够建成现代化的社会主义社会。这些书籍所蕴藏的思想财富和学术价值,为学人所熟知,毋需赘述。这些译本过去以单行本印行,难见系统,汇编为丛书,才能相得益彰,蔚为大观,既便于研读查考,又利于文化积累。为此,我们从1981年至1998年先后分八辑印行了名著三百四十种。现继续编印第九辑。到2000年底出版至三百七十余种。今后在积累单本著作的基础上仍将陆续以名著版印行。由于采用原纸型,译文未能重新校订,体例也不完全统一,凡是原来译本可用的序跋,都一仍其旧,个别序跋予以订正或删除。读书界完全懂得要用正确的分析态度去研读这些著作,汲取其对我有用的精华,剔除其不合时宜的糟粕,这一点也无需我们多说。希望海内外读书界、著译界给我们批评、建议,帮助我们把这套丛书出好。

商务印书馆编辑部

2000年6月

修 订 说 明

一

艾哈迈德·爱敏(1886—1954) 20世纪阿拉伯世界最负盛名、最有影响的伊斯兰学者之一,埃及著名历史学家、文化哲学的启蒙思想家。毕生致力于阿拉伯历史文化的研究,留下了几十部著作,其中三卷八册本的《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史·黎明时期》、《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史·近午时期》和《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史·正午时期》影响最大,被称为“艾哈迈德·爱敏伊斯兰百科全书”。

艾哈迈德·爱敏出生在埃及三角洲库姆赫拉特村的一个贫苦家庭。进过私塾和清真寺小学。后在公费的爱资哈尔大学和伊斯兰高等法学院学习。1911年毕业后,先后担任中学教师和法官。1926年任开罗大学教授,1939年任文学院院长,1954年去世。

在开罗大学任教后,即同他的挚友、盲人文豪塔哈·侯赛因和著名历史学家阿巴迪商定,分工撰写三部多卷本的阿拉伯历史著作。阿巴迪写《政治史》,塔哈·侯赛因写《文学史》,艾哈迈德·爱敏写《文化史》。按历史分期统一书名为《伊斯兰黎明时期》、《伊斯兰近午时期》和《伊斯兰正午时期》,书名下各副标题为:《政治生

活》、《文学生活》和《学术思想、宗教、文化生活》。但是后来仅艾哈迈德·爱敏一人完成了三卷八册的《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史》写作，书名未变。第一卷一册，第二卷三册，第三卷四册。

该书从1929年首卷《黎明时期》的问世，到1953年第三卷第三册的出版，历时二十四载。第一至七册的出版时间依次是：1929年、1933年、1935年、1939年、1945年、1952年和1953年，第八册则是在1954年艾哈迈德·爱敏去世后由著名历史学家艾哈迈德·福瓦德整理出版。

全书史料丰富、内容翔实、立论公允、见解精辟、论述清晰、文笔流畅，出版后受到阿拉伯学术界高度评价：

“这部巨著是用最可靠的史料写成的，文字畅达，见解精辟，是一部阿拉伯文化史的光辉巨著，是阿拉伯文化的知识宝库。”（著名学者穆斯塔法·西哈比）

“这部巨著是献给当今世界的一部最珍贵、最丰富、最不朽的宝藏。”（著名文豪塔哈·侯赛因）

“这部巨著是考察伊斯兰文化的灯塔。”（著名历史学家艾哈迈德·福瓦德）

“本书对阿拉伯，对穆斯林的学术、思想、文化等的发展，作了前无古人的研究与论述，是一部不朽的学术著作，是著者聪明睿智、努力奋斗的见证，是他冲破重重障碍，克服种种险阻，踏破道道难关，穿过崎岖小路才获得的珍贵成果。其流传之广，影响之深，迄今无人可比。”（著名文学家哈桑·齐亚特）

二

纳忠(1909—2008) 中国穆斯林著名学者、中国阿拉伯语界的一代宗师、阿拉伯历史学家、阿拉伯语教育家、中国研究阿拉伯伊斯兰历史文化的开拓者和奠基人。字子嘉。回族。云南海通纳家营人。先后就读于昆明永宁清真寺、昆明省立师范附属小学、昆明城南清真寺及该寺附设的中阿并授学校、昆明法文学校和云南明德学校(云南第一所回民现代中等学校)。

从1927年开始,纳忠相继向北平的《月华》旬刊、天津的《伊光》月报、广州的《天方学理》月刊、云南的《西南日报》以及上海开明书店的《开明周刊》投稿,并被发表。

1929年年初,云南回族俱进会成立,该会的学术刊物《清真铎报》请纳忠任编委,主编同年2月10日刊发的创刊号。他共主办了十六期,独自撰稿四十多篇,约十万余字。

1931年被云南回族俱进会选送伊斯兰教的最高学府——埃及爱资哈尔大学深造。

留学期间的纳忠,博览群书、孜孜不倦;拜访名师,四处听课;边学边译,硕果累累:

1932年翻译了埃及著名学者曼苏尔的《伊斯兰教》一书(北平成达师范出版部,1934年出版);

1934年翻译了叙利亚著名学者库迪·阿里的《伊斯兰教与阿拉伯文化》一书(上海回教书店,1936年出版)。

1936年荣获爱资哈尔大学最高委员会授予的学者证书。这

是第一位,也是唯一一位获此殊荣的中国留学生。

在到处都是宗教书籍的环境里,纳忠以学者的睿智和特有的敏锐,认定艾哈迈德·爱敏的《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史·黎明时期》是一部不可多得的学术专著。他为了译好该书,拜访了当时在开罗大学文学院任教的艾哈迈德·爱敏教授。强烈的求知渴望、谦逊好学的态度和深厚的阿拉伯语功底打动了教授。在争得校长塔哈·侯赛因的同意后,除破例允许纳忠免费在开罗大学旁听课程外,还每周抽出一个小时为他答疑解惑,时间长达一年之久。

1940年,纳忠学成回国前向艾哈迈德·爱敏辞行时,爱敏将《黎明时期》一书送给他,并在扉页上写道:“我非常高兴,也非常愿意,纳忠为我翻译这部书,并感谢他对宗教学术做出的巨大贡献。”

纳忠于1937年冬开始在开罗翻译该书。译完后将译稿寄给上海商务印书馆。书名为《黎明时期回教学术思想史》。著者译为阿明。在总编辑、历史学家何炳松的亲自过问下,该书于1939年由长沙商务印书馆出版。

十九年后的1958年,商务印书馆又出版了该书。书名为《阿拉伯文化的黎明时期》,著者译为阿赫默德·艾敏。

艾哈迈德·爱敏的这部巨著被纳忠先生视为“迄今阿拉伯文化史中的一部极其重要的划时代的著作”。将全书译成中文是纳忠先生的宿愿。

1981年,纳忠先生将自己的旧译《阿拉伯文化的黎明时期》一书,根据1964年出版的阿拉伯文原著第九版重新改译,并根据原著副标题改名为《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史·黎明时期》。该书1982年出版。

此后,纳忠先生指导他的学生翻译了其余各卷册。《近午时期》卷的三册书(即全书的第二、三、四册)的译者分别是:

第二册:朱凯 史希同

第三册:向培科 史希同 朱凯

第四册:朱凯

《正午时期》卷的四册书(即全书的第五、六、七、八册)的译者分别是:

第五册:史希同

第六册:赵军利(纳忠先生的博士生)

第七册:史希同 张洪仪(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教授)

第八册:史希同 吴旻雁 马学忠(二人均为史希同的博士生)

各册的出版时间分别是:1990年、1991年、1995年、1999年、2001年和2007年(七、八册)。

三

值此本书被列入“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之际,译者对全书作了认真修订,具体情况如下:

一、为了表示对已逝译者的尊重,《黎明时期》的译文由纳忠之子纳家宝校订。《正午时期》(二)的译文由赵军利的姐姐赵军秀(首都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校订。

二、朱凯修订《近午时期》(三),补译《近午时期》(一)的序言和塔哈·侯赛因的序言。

三、吴旻雁修订《正午时期》(四),补译艾哈迈德·福瓦德的序言。

四、张洪仪修订《近午时期》(一)、(二)和《正午时期》(一)、(三):规范、统一部分人名、地名的译法;修改个别文字;补译漏译和未译的文字、诗句。其中以《正午时期》(一)中未译的诗最多(原文有诗 668 行,原译仅 200 余行),补译诗 436 行,恢复了原著的文学风采。此外,还补译了《正午时期》(二)中未译的 90 行诗。在此基础上,原译者再对原译文及张洪仪修改、补译的文字进行了校订。

五、史希同校订除《近午时期》(三)之外的各册的修改文字、补译文字及他本人所译部分。

本书卷帙浩繁、学术门类众多、典籍人物庞杂、资料年代久远;几乎处处有诗,页页需注;加之译者水平与能力有限,定有疏漏、错误或不当之处,恳望同仁和读者赐正。

史希同

2015 年 10 月

译者序言

——八册本《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史》简介

艾哈迈德·爱敏是二十世纪阿拉伯世界最负盛名、最有影响的伊斯兰学者之一。毕生致力于阿拉伯历史的研究,留下了几十部著作,其中八册本《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史》影响最大,被称为“艾哈迈德·爱敏伊斯兰百科全书”,至今已印行九版。一部学术著作,流行如此广泛,影响如此深远,在阿拉伯国家实属罕见。1954年艾哈迈德·爱敏去世后,埃及学术界为了纪念他在学术上的巨大成就,设置了“艾哈迈德·爱敏奖学金”,每年以相当数量的奖金,连同他的全部著作,奖给埃及研究阿拉伯历史的优秀青年。

艾哈迈德·爱敏出生于埃及三角洲库姆赫拉特村的一个贫苦家庭。父亲是佃农,兼任乡村教师。除缴纳沉重的地租和苛捐杂税外,还负担无穷尽的强制劳役。他在农村中没法活下去,只好逃到开罗,在一家印刷厂做校对,曾一度任清真寺教长。艾哈迈德·爱敏进过私塾和清真寺小学,后来进入公费的爱资哈尔大学和伊斯兰高等法学院。1911年毕业后,他先后任中学教师和宗教法官,1926年任开罗大学教授,1939年任文学院院长,1954年去世。

二十世纪初,艾哈迈德·爱敏青年时代,正是埃及民族、民主运动蓬勃兴起的伟大时代。

公元十六世纪,土耳其奥斯曼帝国开始统治阿拉伯国家。由

于长期封建残酷统治的结果,阿拉伯文化遭受了严重的破坏:丰富多彩的阿拉伯语言失去了它往日的光辉,朝霞般的阿拉伯文学只剩下几许残照,浩瀚无边的阿拉伯文化遗产,已被弃如敝屣。土耳其人统治的几百年内,值得一提的阿拉伯诗人、作家和学者,寥若晨星,屈指可数。如果说,这几百年内阿拉伯文化史,等于一纸空白,亦非夸张。

十九世纪,随着西方殖民主义的侵入,大批西方考古学家和“东方学”学者,涌向了阿拉伯东方,或发掘古墓,盗走古物;或将大批阿拉伯古典珍本转移西方。直到二十世纪初,阿拉伯人依然抱残守缺,蜷曲在清真寺的圆柱下面^①,接受繁琐的经院教育。艾哈迈德·爱敏的童年生活,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中度过的。

随着埃及民族、民主运动的高涨,埃及资产阶级文化的启蒙运动也方兴未艾。1906年,埃及创办了第一所新型大学——今开罗大学的前身。艾哈迈德·爱敏在爱资哈尔大学和高等法学院学习期间,从当时伊斯兰维新派学者穆罕默德·阿布杜等听讲,接触到了西方资产阶级思想。这些维新派学者在讲授《古兰经》或阿拉伯文学时,常提到西方的伏尔泰、卢梭、雨果、歌德、雪莱……把学生从“爱资哈尔式”的传统教育,引向西方思潮,艾哈迈德·爱敏受到很大影响。他没有到西方留过学,可是他精通英文,阅读了西方资产阶级的大量哲学、历史著作。他感到许多阿拉伯文的古典著作,在东方不易找到,在西方却翻译和印行;又在西方“东方学”学者关

^① 中世纪,伊斯兰教师在清真寺圆柱下,设座讲学,学生席地而坐,围成半圆,屏息听讲。

造……形成“阿拉伯伊斯兰文化”的光辉灿烂时期(正午时期)。本书卷帙浩繁,这篇译者序言只能选择著者始终贯穿于本书的几个重要问题和论点,给以简单的评介。即继承、发展、创造——穆斯林各民族共同创造的文化结晶;阿拉伯语的发展;伊斯兰教的发展与变化;以及奴隶与“释奴”的贡献。这几个问题,正是著者关于三种源流的阐述与论点。

继承、发展、创造

——穆斯林各民族共同创造的文化结晶

伊斯兰教兴起后,阿拉伯人大举向外扩张,建立了幅员辽阔的阿拉伯帝国,接触到叙利亚文化和古希腊文化,接触到波斯文化和印度文化,并开始从阿拉米文(古叙利亚文)翻译了关于医学和天文学的书籍,同时也开始翻译波斯和印度的著作。但是在倭马亚王朝时期,翻译工作仅由少数穆斯林和犹太教徒、基督教徒自由进行,没有计划,没有系统。这是阿拉伯文化的“黎明时期”。

公元八世纪中叶,阿拔斯王朝建立后,阿拉伯人的军事扩张已基本停止,帝国的局势日渐安定。随着政治、经济的发展,文化生活也呈现出一派繁荣景象。阿拉伯封建统治阶级迫切需要将波斯、印度、希腊的古典著作系统地译为阿拉伯文。哈里发麦蒙时期(公元813—833年),是阿拉伯人的翻译事业达到极盛的时期。麦蒙派人到拜占庭,要求拜占庭皇帝代为搜集古典抄本;又鼓励穆斯林远行各方,既搜寻古籍,又访求学问。阿拔斯王朝时代,穆斯林搜集到的古籍都汇集到巴格达。巴格达城有如古代文化遗产的无

尽宝藏。

麦蒙在巴格达建立了一所翻译和研究的机构,叫“智慧之宫”,把搜集到的古籍大量地译为阿拉伯文并进行广泛而深入的研究。

哈里发提倡学术翻译,鼓励穆斯林学习阿拉伯文译本,王公大臣亦竞相效尤,以爱好和提倡学术文化为标榜,从而提高自己的地位。于是散居各地的翻译家,争先恐后地涌向巴格达,穆斯林从事翻译与研究蔚然成风。从阿拔斯王朝初期,两百年内(主要是阿拔斯王朝第一期,公元750—844年),在巴格达和其他各大城市,形成了一个波澜壮阔的、史无前例的“翻译运动”,这就是“阿拉伯伊斯兰文化”的“近午时期”,穆斯林已成为东方(波斯和印度)与西方(希腊、罗马)古代文化遗产的继承人。

毫无疑问,中世纪出现的阿拉伯人的“翻译运动”,是值得大书特书、载入史册的,但是有的西方历史学家力图贬低阿拉伯人的翻译事业,把这种翻译事业说成“只不过是希腊罗马文化的一点余光”^①。其实各民族在自己的文化发展过程中,必须互相学习、互相充实、互相继承,这是人类文化发展的必然规律。学术文化是人类共同享有的,每一民族必须向别人学习,也必然有自己独特的文化,历史上绝对没有任何民族,在文化上专门引进,毫无创造;也没有任何民族,专门创造,毫无引进。何况中世纪穆斯林对外来古典著作,不是简单地从事翻译,他们对古籍还进行了大量的考证、勘误、增补、注解、诠释的工作。这些历史事实,是彰明昭著,无可否认的。阿拉伯文译本,在公元12、13世纪被译为拉丁文和西方各

^① 转引库迪·阿里《阿拉伯与伊斯兰文化》上册,第56页。

种文字,西方大学以这些译本为教材者五百余年,为西方文化的发展立下了汗马功劳。

艾哈迈德·爱敏认为,大量的翻译工作,仅仅是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发展的基础。“翻译运动”赢得了学术、文化的发展与创造,那就是公元9世纪中叶到11世纪的“阿拉伯伊斯兰文化”的“正午时期”,也就是文化繁荣灿烂的时期。

公元九世纪中叶至十一世纪,阿拔斯王朝逐渐衰替,濒于瓦解;帝国东西各地,纷纷自主,或名义上隶属于巴格达,事实上割据独立。著者认为,阿拉伯伊斯兰帝国虽已分崩离析,但东方诸小国仍大力提倡伊斯兰教,承认巴格达“哈里发正统”,励精图治,政治与经济都有了很大的发展;打上“伊斯兰精神”烙印的阿拉伯学术、文化,日益昌盛,发明创造,光辉灿烂,构成了“阿拉伯伊斯兰文化”百家争鸣的局面。如撒马尔罕、伊斯法罕、大马士革、开罗、拉巴特、西西里、科尔多瓦……都是和巴格达繁荣时期媲美的阿拉伯伊斯兰文化中心。这里,涌现出大批穆斯林学者,他们的学术著作日益丰富多彩,学术研究的领域日益广泛,举世著名的学者如:医学家拉齐、伊本·西拿、宰赫拉威、伊本·海赛姆;天文学家如白塔尼、比鲁尼、欧麦尔·赫雅木等;数学家如花拉子密、艾布瓦法等;化学家(炼金术)如查比尔·伊本·哈彦等;动物学家如查希兹;地理学家如伊德里斯、雅古特、艾布·费达等;哲学家如肯迪、法拉比、伊本·西拿、伊本·鲁世德等;历史家如白拉祖里、塔巴里、麦斯欧迪、伊本·艾西尔等;诗人文学家如爱布·诺瓦斯、爱布·太希雅、穆台纳比、爱布勒伊拉等,以及《罕世瓔珞》的著者伊本·阿卜杜·莱比和《诗歌集》的著者爱布·法拉吉等。穆斯林学者,一